



中华民国 外交史新著

第二卷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石源华 / 著



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

第二卷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石源华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卷目录

第三编 日本再破列强在华“均势”和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 (1931年9月~1937年7月)

第十一章 东北战火 对日外交比重再次上升 / 461

第一节 依赖国联外交 / 461

第二节 恢复中日直接交涉 / 479

第三节 拉美国家排华风潮交涉 / 503

第十二章 战略调整 国民政府组建国际反日战线 / 512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外战略大调整 / 512

第二节 争取欧、美、苏大国援助中国 / 515

第三节 中国与国联关系新发展 / 529

第十三章 华北事变 国民政府变换对日方针 / 541

第一节 日本与英、美在华竞争及中国的应对 / 541

第二节 步步退让的中日华北交涉 / 554

第三节 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变化 / 573

第四编 战时抗日外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十四章 中日大战 推行全面抗日外交 / 597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方针 / 597

第二节 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 / 609

第三节 继续开展战时国联外交 / 626

第四节 日本诱降与中国抗战营垒分化 / 637

第十五章 苦撑待变 国民政府的抗日求援外交 / 652

第一节 联苏外交 / 652

第二节 联英外交 / 670

第三节 联法外交 / 676

第四节 争取德、意中立 / 681

第五节 积极谋求美国援华 / 687

第十六章 加盟盟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 / 701

第一节 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 701

第二节 争取美、英加强援华 / 716

第三节 签署中美、中英新约 / 737

第十七章 并肩战斗 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 / 755

第一节 援助印度独立运动 / 755

第二节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 / 768

第三节 援助越南独立运动 / 781

第四节 援助缅甸独立运动和反日斗争 / 790

第五节 援助菲律宾人民反日斗争 / 796

第六节 援助战时“自由泰运动” / 800

第十八章 风云变幻 中国与同盟国的分歧 / 808

第一节 与美国的冲突与交涉 / 808

第二节 中英关系的波折 / 835

第三节 中苏关系的恶化 / 849

第四节 《雅尔塔密约》与中美苏关系 / 858

第十九章 迎接胜利 抗日战争后期的外交 / 880

第一节 收复失地之准备 / 880

第二节 迎接胜利的外交努力 / 892

第三节 参与战后国际政治安排 / 904

第二十章 穷途末日 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日汪关系 / 932

第一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出台 / 932

第二节 汪政府对英美“宣战” / 936

第三节 日汪“新约”的签订 / 942

第四节 日汪结成“同盟”关系 / 952

第五节 汪政府“统一”沦陷区 / 957

第六节 日本通过汪伪“谋和” / 965

第三编

日本再破列强在华“均势”和
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1931
年9月~1937年7月）

第十一章 东北战火 对日外交 比重再次上升

第一节 依赖国联外交

1. 九一八事变与不抵抗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的原因。

第一，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部扩张派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1930年12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3阶段计划：一为平定阶段：将中国在满洲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全覆灭；二为统治阶段：使朝鲜人经营水田，中国人经营小商业，日本人经营大企业；三为国防阶段：整个满洲的收入足够扩充占领费用，且有剩余。^①1931年3月，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步兵学校讲演《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更是鼓吹“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着很深的特殊关系”，“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强调“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②

第二，九一八事变也是日本统治集团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视线而采取的侵略行动。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以前历次危机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时间更长，危害更烈。1930年，危机波及日本。1931年，进入最为严重的阶段。日本统治阶级把强占中国满蒙地区作为日本扩大海外市场、摆脱危机的重要出路，将发动战争视为转移人民视线的重要手段。石原莞尔鼓吹：“我国几乎无路可走，人口粮食及其他重要问题皆无法解决，唯一途径就是断然开发满蒙。”^③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第76页。

② 〔日〕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63、第139～144頁。

③ 〔日〕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三）、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第78頁。

第三，九一八事变也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张学良集团在东北的矛盾已达到激化地步。皇姑屯事件后，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张学良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首脑，他表示服从南京政府，毅然实行“易帜”，并积极引进英、美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以抵抗日本侵略。1930年，以美国资本为主的葫芦岛港完工，与中国经营的大虎山至通辽铁路实行联运，使日本控制的大连港及南满铁路收入大为减少，也使苦心经营满蒙的日本统治者感觉到自身地位的动摇。他们竭力叫嚣：“日本在满蒙的生存权日益土崩瓦解，要挽回这个局面，除了实力发动外，别无他途。”^①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派往东北视察之郭同曾具体描述了中日在东北冲突之情形：“日本人在东北之态度，殆已一言难尽。简言之，上自日本政务官，以迄商人、浪人，罔不视东北为其征服地，对中国人直无礼貌之可言。林总领事尤倔强倨傲，自居于朝鲜总督地位，其权威直等于驻华大使。东北方面，外交人才极缺乏，中日间交涉，截止前年止，悬案未解决者，4百余件。历任外交官皆萎靡不振，胆小如鼠，平时不知联络感情，有事时怕见人说话，以少花钱、少出事为职志，甚至应拍电报，亦设法改快信。日人欺我之事，能忍则忍之，决不欲计较惹事。我之尊严既坠，日人乃益骄横。由去年迄今，中日间新发生之交涉悬案，又已1百余件。”^② 日本与张学良之间各种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终至导致爆发九一八事变。

第四，西方列强陷足于世界经济危机不能东顾和中国新军阀内战也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袭击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涉及工业、农业、商业等几乎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各国都自顾不暇，无力对于日本侵略的行动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行动。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建立后，连年不断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军队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战争，几乎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牵制了全部的军队。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中原大战，双方出动近百万兵力，最后张学良率20万东北军入关助蒋，东北防务大为减弱，使日本侵略者得到了轻易取胜的机会。

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会同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召回关东军参谋长，将此大纲作为指令交给关东

① [日] 三宅正树、秦郁彦、藤村通生《军部支配の開幕》、日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3、第88页。

② 《郭同由辽到津之谈话》，《申报》1929年10月22日。

军。这个大纲提出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全面计划，将准备时间定为1年，“在今后一年里隐忍持重，避免卷入因排日活动而产生的纠纷，万一发生纠纷时，只限于在局部范围内处理，不扩大其范围”，“取得国内外的谅解”。^①但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人已经不满足于这张时间表。7月下旬，制订了“柳条沟计划”，并利用万宝山事件^②和中村事件^③积极煽动战争舆论，威胁出兵干涉，使这两个事件成为九一八事件的前奏。

9月18日晚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诬称为中国军队所破坏。随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以侵占中国东北为目标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在东北驻军19万，日本关东军仅1万余，中日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日本侵略者竟在一夜之间袭占沈阳，一日之间掠城20余座，百余日即占领整个东三省，其主要原因是东北军奉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7月，当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担忧该事件会导致“全国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④8月，中日交涉中村事件时，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⑤9月6日，张学良

① [日]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第164頁。

② 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的前奏。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朝鲜移民李升薰等180余人在吉林省长春附近的万宝山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不仅无理占用中国农民土地400多亩，而且有可能导致水渠附近中国农民的数万亩低地被河水淹没，引起中国农民的抗议和冲突。日本驻长春领事不仅拒绝中国政府制止李升薰挖渠筑坝的正当要求，而且引来大批朝鲜人帮助李等挖渠，派遣便衣警察携带机枪前往保护。中国农民愤而自动集合500余人，填平水渠，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开枪，并保护李升薰等恢复挖渠通水。此事引起中日严重交涉，谈判陷入僵局，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导火线之一。

③ 1931年6月初，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化装成中国农民，至中国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在搜出大量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后，自行秘密处死，此事为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查实，酿成重大外交交涉事件。尽管中方表示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该问题，蒋介石甚至表示要对屯垦军第三团团长进行军事审判，予以严惩。但日本不以此为满足，企图“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该案成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又一导火线。

④ 《蒋介石禁排日运动 向国府及张学良通电》，《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

⑤ 胡愈之：《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第24页。

致电辽宁省代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转达南京政府命令：“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①由于南京政府三令五申，不抵抗主张被贯彻至东北地方军政各部门及军队之中，大敌当前，首先解除了自身的思想武装和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和军事准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日军的猖狂进攻面前，南京政府依然没有改变这一错误政策。9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严重紧急抗议，促其电达日本政府，令日本军队停止一切行动，即日撤回原驻地点。^②但决心发动侵略东北战争的日本关东军根本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面临日军进攻的前线将领火急请示应付方策时，得到的回答却依然是刀枪入库，力避冲突。据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③不抵抗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开门揖盗，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让。

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由蒋介石直接制定和下达的，是其整个外交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敌当前，国民政府何以要推行不抵抗政策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点。第一，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直接导源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蒋介石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于反蒋派系和共产党及红军的战争，当“安内”与“攘外”相交织时，蒋介石总是将“安内”放在首位。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蒋介石更视为心腹之患，蒋、冯、阎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就于1930年12月、1931年2月和7月先后出动10万、20万、3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而置东北防务于不顾。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首先考虑的仍然是继续发动“剿共”战争，以除去“心腹之患”。

第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根源于蒋介石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蒋介石早年曾留学日本军事学校，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培植了他对日本的盲目崇拜和过高估计。他虽然不甘心屈服于日本，但总是认为中国“一切

① 《日人中村案》第103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② 《日本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社评），《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

③ 《反动派出卖东北罪行》，《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

不如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曾说过，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与估计，他虽然在国际上走英美路线，不肯承诺日本的狂妄侵略要求，但又十分惧怕日本，不敢与之较量，而是采用不抵抗政策来应付。

第三，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来源于南京最高当局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战略意图估计不足，认为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有限行动，在获取其战略利益后，日军会自动退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山东问题不与日本直接交涉、采用“国际化”方式索回之历史经验继续影响着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全面奉行依赖国联的政策，企图等待日本在国际干预下自行从中国退出。

第四，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与其依靠欧美和国际联盟的政策密切相关。自晚清以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下，“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方针得到中国历朝统治者的推崇和运用，从李鸿章到袁世凯一脉相承。南京政府建立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认为欧美各国在华拥有巨大利益，不会容忍日本独霸中国。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南京政府不是立足于自身的自卫和抗争，而是想打“欧美牌”，引进欧美势力来遏制日本侵略。

第五，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与其部分高级官员牺牲东北、保住本部的主张有关。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中心在长江下游。对于他们来说，东北地区虽然也是“统一”中国所必需的，但并非誓死必争之地，由于“和平易帜”后东北地方势力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南京政府对于该地的实际控制力非常有限。因此，早在1927年底，蒋介石与日本田中义一首相会谈达成的谅解中，就有“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的内容。

2. 特种外交委员会

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决定急电在江西指挥“剿共”战事的蒋介石返回南京，“共议内外应付之方策”。同时，由于对事态的发展程度尚不清楚，在最初的一两天内曾企图与日本直接交涉解决事变。当时正在北京治病的张学良召集北洋外交元老征询处理意见，颜惠庆、顾维钧主张派员到沈阳，质问本庄司令官究竟目的何在；曹汝霖则主张“最好作为地方事件”，“可商即商，务

^①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文化供应社，1949，第22页。

宜速结，不宜拖延”；张学良以向南京政府请示为由，未作决断。^① 新任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也极力主张直接与日本交涉。他认为：“当时我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应知日本少壮军人之抬头及把持政权，决非我国之福。所以当稳健自由分子犹能得议会支持及天皇信任，军方之主管，犹属老成持重的军人时，应当和这般稳健的政治家取得联系，共谋抑制其过激分子的办法。如果我国一味拒绝与日本任何谈判，使彼邦有心人欲求改善中日关系，亦无处着力；其强硬分子，在我国不抵抗政策下，又有不折不挠，无损一卒而掠地千里之奇功，则相形之下，自由和平分子自然无从立足，同黥武之军人，自然更加嚣张专横，逐渐演成军人独裁之局面。我国地处毗邻，适当其冲，自不免更受无穷之祸。”^② 《蒋作宾回忆录》提及：他曾与时任日本内阁外相的币原重喜郎^③商定，“以外交途径解决，彼提出要求我承认商租权，彼取消领事裁判权，即开始撤兵谈判。时我正在国联进行控诉，连电阻止。一般人皆曰世界大战即将发生。余曰否，因美国海军未充实，不敢战；英国经济恐慌，不能战；法国持盈保泰，不欲战；俄国素利用帝国主义冲突，不肯战；世界大战何由发生？况国人此时毫无准备，胜败均于我无利。九一八事件不如一面利用国联，一面自己设法了结”；可惜“未得允许。其后币原去职，犬养上台，亦有意进行解决，终遭殒命”。^④

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召集国民党军政要人决定“对日方策”：1. 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2. 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3. 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3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4. 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

①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218页。

② 事后，蒋作宾时常提起：“清咸丰时的叶名琛，就是专用推诿不理的方式，来对付当时英国通商的要求，等到英国兵临城下，又只拿出‘不战不和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的笨法子来应付。结果被英人活捉而去，当作珍禽异兽，令他整天穿着朝服，供人观览。不料叶名琛的‘不交涉，不抵抗’的政策，竟又重演于九一八前后和东北，真是中国的不幸！”参见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13～22页。

③ 币原重喜郎被认为系日本政府内主张对华缓进的代表人物。1931年夏，他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国向南京政府报告：“一个大事变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138页。

④ 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第54页。

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① 这个对日方针归纳起来即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进行交涉，完全依赖国联主持公道。

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举行的党员大会上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② 次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内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③

据此，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成立，由戴季陶和宋子文分任正副委员长，顾维钧任秘书长，于右任、陈立夫、丁惟汾、颜惠庆、朱兆莘、罗文干、李石曾等为委员，在蒋介石领导下讨论决定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以及在国联会议上的立场和处置方略。11月，该委员会通过决议《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全面阐述了南京政府对于局势的估计及对日方针，要点如下。

1. “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现在（日本）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

2. “判断日本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除中国固有政治军事势力为主要目的”，“现在日军既占领黑龙江省，复集中力量企图消灭锦州军政势力，以铲除我在东三省号令机关，对于平、津、青、济、沪、宁、武汉等之各种阴谋，全为达成其根本目的之手段”。

3. “判断国联之目的，始终在尽力消除日本上项计划之实行与成功，英法皆同，外间各种怀疑非事实。但各国重要政策因计划皆未完成，故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国联不能采取任何有力制裁。”

4. “判断美国态度，至今虽极力避免表示意见，但将来必要时将运用《九国条约》，出而对日本作有力抵制之可能。”

5. “判断此次对日交涉，中国在国际上必得最后之胜利。此时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以下简称《初编》），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第281页。

② 《中央告同胞三事 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

③ 秦孝仪主编《初编》绪编（一），第286～287页。

一切政策以团结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为根本要图。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第二，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

6. “判断此时仍须尽力表示中国政府完全信任国联之意思。如此，第一，对于国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第二，不致伤害各国之感情；第三，将来运用《九国条约》，而对美国做工夫时较易说话。”

7. “日本国内反陆军政策之力量并不弱，且部分甚多，惟此时均被军部举国一致之威力所屈服；但至军部政策用尽时，一切反陆军政策之势力必继起执政，至此中日间方入纯正外交时期”；“但此时期之实现尚远，吾人须知将来对日外交必有办法，而不能此时即有办法。”^①

该文件对于时局的估计除个别处外，大体正确，但决策却充满矛盾：明知国联不足恃，却仍全力依赖国联；明知解决事变“应以军事为前提”，却仍将希望寄托国联、美国以及日本国内反陆军派势力的复起，这就不能不在行动中处处碰壁。

11月底，蒋介石眼见国联对日本侵华暴行束手无策，一度曾想改而与日本直接交涉。其重要行动是：11月28日任命当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的顾维钧署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时发表演讲说：“有形战争只限于军事，无形战争则包括一切，无时不在进行中”，“外交之折冲樽俎，其致力之远，收效之大，有远胜于军事十倍千倍者”，希望顾氏“布展其抱负，发挥其长才”，“俾我国外交，得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庶不负政府与国民期望之殷也”。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此项任命表明蒋介石“觉得必须对日谈判”，但又“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于是，要顾维钧任外交部长，“首当其冲”。^②

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反蒋运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猛烈抨击。由于各方面的反对，不仅对日直接谈判未能实现，而且出现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强烈呼声。11月，南京国民党“四大”通过了《请蒋速北上，收复失地的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86～87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5页。

紧急动议案》，全国掀起了“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但广州反蒋派坚持要蒋下台。12月15日，蒋介石决定“下野”。12月28日，对立的宁粤双方组成“统一”政府，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对日外交仍是一筹莫展。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全国舆论纷起抨击孙科政府，要求对日实施绝交、宣战、武力抵抗。然而，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由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无人主持，新政府实际上不能决定任何重大问题。孙科对记者公开辩称：政府原定方针，“现应否变更？如何变更？权在中政会，而不在行政院”。^①由于孙科政府无力应付内政外交的严重局面，国民党内的亲蒋派又发起迎蒋复职运动。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作了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重要演讲，阐述了他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四不”方针，即所谓“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为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及依赖国联政策作了辩护，指责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群言庞杂”，“莫所折衷”，“非特不能爱国救国”，反“适以误国”。他坚决反对对日绝交与宣战，认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如果对日宣战或绝交，“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而且日本是“战而不宣”，其目的就在于“欲避宣战之责任”，“以减轻国际之责难”，“今我明明尚无战之实力”而对日绝交宣战，这不仅将给日本“加责任于我之机会”和“恣行无忌之口实”，而且“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负“破坏和平、破坏公约之责”，因此，对日绝交与宣战是“自取灭亡”的“绝路”。呼吁国民“信任今日之政府，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并保证政府“绝对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等，^②为其重新上台作了外交政策方面的准备。蒋氏在发表演讲后，即赴杭州与汪精卫秘密会晤，将汪精卫从广州反蒋派中分化出来。1月21日，蒋、汪同返南京，组成蒋汪合作的新政府，蒋主军，汪主政，“共赴国难”，处理上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新的外交局势。

3. 中日国联初次交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奉行依赖国联外交。其基本特征是：

^① 《晨报》1932年1月6日。

^② 《蒋汪昨先后到京》，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

1. 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为对日批判和斗争的旗帜；2. 以东北问题国际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为处理东北问题的原则；3. 以恢复事变前原状为交涉目标；4. 以“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为不抵抗方针的基本特征；5. 以委曲求全，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为交涉策略；6. 起用“国际派”外交元老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等，推行新的外交人事政策等。但国联却在英、法操纵下，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实行绥靖政策，使中国对于国联的幻想不断破灭。

9月19日，适逢国联行政院举行第65届常会第1次会议，中国代表施肇基奉命就九一八事变请求国联“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并保证中国服从国联关于此事的任何决定。会上，施肇基和日本代表芳泽谦吉进行辩论。21日，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说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经过和中国未作抵抗的事实，请求秘书长立即召集行政院会议，根据盟约第11条赋予的权利，“立采步骤，阻止情形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及数额”。^①22日，国联行政院讨论中国请求，施肇基宣读国内来电，说明日本武力占领经过以及情势的严重。芳泽则称，该事件为“偶然事件”，“因中国军队毁坏沈阳附近日本铁路之一部分所致”，并保证日本“并无扩大局势，或对中华民国开战之意”，认为此次纠纷可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解决，警告国联行政院“如干涉过早，结果必不堪设想，徒足鼓起日本已激昂之舆情，有碍和平之解决”。^②当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第一个决议案，决定授权行政院主席紧急要求中日两国“力避足使局势严重或妨碍本问题和平解决之任何行动”，设法会商中日两国代表，寻觅适当办法，俾两国能立撤军队，勿使两国人民生命及财产之安全，陷于危险，并将会议记录及有关纠纷之文件送致美国政府。^③这个决议没有区分侵略与被侵略，表明国联不敢主持公道。

对于国联的决议，南京政府表示“欢迎并完全接纳”，严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又称“局势每小时益臻严重，行政院应施用有效之方法，不容延缓”。日本政府则谎称，其行动“并不构成军事占领”，“在维护日侨安全及铁路防卫所容许之范围内，日本已正在尽速撤退，一

① [美] 韦罗贝：《中日纠纷与国联》（中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26～27页。

② [美] 韦罗贝：《中日纠纷与国联》（中译本），第41～42页。

③ [美] 韦罗贝：《中日纠纷与国联》（中译本），第46页。